
发展研究丛书

金融发展中的信用 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杨 洋 著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Credit Bounda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发展研究丛书

金融发展中的信用 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杨 洋 著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问题研究/杨洋著.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 - 7 - 5141 - 7346 - 8

I. ①金… II. ①杨… III. ①信用 - 研究

IV. ①F830.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160 号

责任编辑: 李 雪

责任校对: 王苗苗

责任印制: 邱 天

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问题研究

杨 洋 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 100142

总编部电话: 010 - 88191217 发行部电话: 010 - 88191522

网址: [www. esp. com. cn](http://www.esp.com.cn)

电子邮件: [esp@ esp. com. cn](mailto:esp@esp.com.cn)

天猫网店: 经济科学出版社旗舰店

网址: [http: //jjkxcbs. tmall. com](http://jjkxcbs.tmall.com)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787 × 1092 16 开 14 印张 210000 字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141 - 7346 - 8 定价: 46.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 8819151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 - 88191586)

电子邮箱: [dbts@ esp. com. cn](mailto:dbts@esp.com.cn))

云南大学“西部发展与社会转型”创新团队建设成果；

云南大学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工程“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社科）”资助

Research

on the Optimal Credit Boundary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总序

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是一个多维度、非线性，具有路径依赖和动态特征的过程。经济的发展既取决于经济体的初始条件、经济基础、社会文化与政治历史，也取决于对国际经济环境变化产生的机会窗口的把握和利用。基于上述条件对包括资源禀赋、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等增长要素的选择、依赖和替代，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水平和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创造了三十多年持续增长的记录，它的跌宕起伏同样也印证了长期发展过程的上述特征。要深刻理解这一过程，必须花一些精力深入研究那些重要的“发展的细节”。今天，中国经济已经从持续的高增长向新常态过渡，由周期性的需求拉动为主向结构性调整为主转换，多视角展开研究，把握典型事例和重要特征，对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转型将十分有益。这就是出版本丛书的一个基本目的。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位置与变动，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必须考察的问题。经济全球化加速了要素资源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以全球价值链分工为基础的国际生产网络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际经济的基本组织范式，各国的生产者不得不在全球价值链下考虑要素在全球的资源配置，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吴明博士在对全球价值链及其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球价值链空间分布的概念，从地理和价值两个维度研究全球价值链空间分布形成机制，并利用国际投入产出模型构建全球价值链空间分布测度指标体系，测度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位置的变化及趋势，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位置变动的原因，并就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分

工中的位置提出了思路。

资源对长期增长的约束，是发展研究中的一古老且重大的命题。早在古典经济学时代，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机制，赵鑫铎博士则从现代经济学的框架出发，研究了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制约，以及如何突破资源制约“瓶颈”问题。他的研究拓展了一般增长模型，引入了自然资源变量，使度量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可能；研究设定了一个参照经济——自然资源与劳动力以相同的速度增长，并定义增长阻力概念，讨论了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阻力及我国各省区经济的增长阻力。赵鑫铎研究发现，中国各省份在地域、文化、收入、教育等方面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各个省面临的资源约束也是不同的，他以能源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着重分析能源对各省份及全国的经济增长阻力。

人口的均衡发展是宏观人口的发展目标和人口实践的新领域。基于均衡人口发展的分析框架，罗平博士构建了一个将人口与其生活其中的环境、所拥有的资源、所处的社会制度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系统，分为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两大部分。在此基础上利用指标体系、评价模型等对我国欠发达和发达地区的评均衡人口发展程度进行比较研究。研究认为，我国总体上的人口均衡发展的程度都不高，都处于“不协调—基本协调—协调”的改进过程中。并认为人口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而经济发展水平并非是人口均衡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不同社会经济发展阶段都可以寻求人口的均衡发展。因此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地区，人口发展的进程、水平与阶段以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性，都具有自身的特性。

在中国城市化浪潮中，需要人们冷静地思考城市化的相关约束条件。王婷博士的研究在厘清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内在关系的基础上，从动态视角测度城市适度人口的规模区间，挖掘制约城市适度人口的短板因素，并从实际人口出发探索达到城市适度人口上限的路径，从理论角度拓展了适度人口的内涵。伴随着我国城市人口数量激增，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城市病”也日益凸显，王婷的研究从动态视角测度我国城市“适度人口”，不仅有利于合理推进我国城市化发展，更重要的是对在我国城市化发

展中寻找城市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平衡关系进行理论探讨，这对我国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是否融合，决定着城市劳动力市场性质和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在城市的非农就业可持续性。陈瑛博士通过考察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决定机制的演变历程，指出我国城市中的就业不充分现象正逐步转变为自然失业和周期失业，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推—拉机制”中的动力与阻力因素发生较大转变，而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因素作用凸显。陈瑛的研究表明，农村影子工资水平的上升减弱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中的引力作用，人口素质上升成为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重要推力，但乡土社会的强关系不利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中的融入，而新生代农民工因制度约束难以实现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因此，进一步推动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需要超越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制度约束：需要如教育体制、土地流转制度以及户籍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政策，改善城市劳动力市场就业分割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城市融入困难问题。显然，其观点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虽然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其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也在不断积累，突出表现在缺乏核心竞争力、低要素成本的生产环境不可持续以及资源环境，导致传统的工业化模式不可持续，必须通过转型来支撑未来的发展。基于这一背景，袁帆博士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以“国家产业集群”为切入点，研究工业化转型问题。他认为，国家产业集群演进是实现工业化转型的重要手段。其主要途径是通过新兴产业集群的培育，传统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升级、出口产业集群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来实现。在宏观层面上要重点推进重工业产业集群等核心集群的升级，对于特定的产业集群，推动其核心成员的升级是推动集群演进的重点。创新能力的培养是其中的关键。为了促进国家产业集群的演进，政府需要实施以集群为作用对象的产业政策，政策的重点在于引导、规制和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

中国经济低碳化如何推进？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业部门的低碳化程度。何旭波博士尝试将能源利用效率和能源 R&D 投入统一到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下进行研究。他将视角锁定在中国工业部门异质 R&D 投入对内生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影响机制上，区分了能源 R&D 投入和非能源 R&D 投入，构建了基于异质 R&D 投入的工业部门内生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分析框

架和数理模型，并试图回答下述问题：异质 R&D 投入如何内生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中国工业分行业的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率如何估算？中国工业分行业的异质 R&D 投入对其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率有何影响？研究主张，用能源节约型技术进步作为能源利用效率的度量指标，进而改善我国既有指标如能源效率、能源生产率等的不足，更完整地度量中国经济中的能源利用效率。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古老但持久不衰的经济学课题，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深度反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并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与改革提供新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准则，已成为发展金融研究的一个新的热点。针对当前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线性范式与非线性范式所存在的分歧，杨洋博士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重新审视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货币与信用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评析，探讨了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与作用机制，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对我国是否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信用最优边界问题进行实证检验，并以此提出了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重点和相关政策建议。

以上对本丛书的内容做了概括性介绍。多年前，云南大学发展研究院曾经出版过一套西部发展丛书，丛书作者从多方面探讨我国西部经济发展问题，诸如西部经济周期特点、东西部人口结构特征比较、能力结构与西部经济发展、生态修复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再平衡等内容。该丛书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我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和社会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推进，未来发展环境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面临的挑战也日益增强，我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也与日俱进，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深入研究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一些重要问题。毋庸置疑，以上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都无法涵盖发展研究这一主题，但是，作为中青年学者的学术研究努力，需要得到充分的肯定和赞许。

是为序。

杨先明

于云南大学东陆校区

前言

后金融危机时代，如何通过有效地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增长，是各国汲取金融危机教训并深刻反思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针对目前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线性范式与非线性范式所存在的分歧，本书提出应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来重新审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本书通过对货币与信用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经济发展理论等相关经济学理论的回顾与评析，探讨了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与作用机制，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对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对信用最优边界的存在性与实现条件进行了理论分析，最后分别基于时间序列和跨行业面板数据对我国是否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信用最优边界问题进行实证检验，以此提出推进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相关政策建议。

首先，通过对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内涵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正负效应与作用机制的研究，本书认为，金融体系适度的信用膨胀水平能够通过促进储蓄率的提高、促进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和资本积累、促进资本边际生产率的提高、促进技术进步或知识水平的提升以及促进产出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效应。而金融体系过度的信用膨胀水平则通过对实体经济形成“挤出效应”、加剧金融体系内生脆弱性与虚拟性、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等不同渠道及作用机制，产生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其次，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分组面板估计方法和面板门限估

计方法对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长期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均显示：在信用膨胀水平低的国家，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较小；在信用膨胀水平适中的国家，金融体系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更强的正向效应；在信用膨胀水平高的国家，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则呈现弱化甚至逆转的趋向。结论表明，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经济增长效应随信用膨胀水平的变化而系统性存在由“低门槛”和“高门槛”所刻画的非线性结构形式，并客观存在一个相对于经济增长而言的金融体系信用膨胀“最适”水平。

再次，基于对当前有关金融适度发展理论的再思考，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并对信用最优边界的存在性、实现条件、偏离类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本书认为，在理论上存在着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某种最佳状态，即信用最优边界。信用最优边界刻画了金融体系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最为理想的一种均衡关系。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要以金融体系信用膨胀与实体部门发展潜在需求的有效匹配作为基本条件：第一，从规模角度，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需要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总量水平（或增速）与实体部门发展的潜在需求水平（或增速）形成有效匹配；第二，从结构角度，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需要金融体系的信用膨胀结构与实体部门发展的潜在需求结构形成有效匹配。错误的金融发展政策、不当的货币和监管体制、法律基础的不完善以及政治因素等是影响现实金融发展偏离信用最优边界的关键性因素。

最后，分别从我国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总量层面和结构层面，对我国是否在金融发展进程中实现了信用最优边界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与金融体系发展优化的相关政策建议。本书认为，从总量层面，我国正处于向信用最优边界收敛的过程，然而，从结构层面，现实金融发展对信用最优边界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偏离，主要体现为银行体系信用配置结构与实体部门由增长潜力所决定的潜在信用需求结构发生严重偏离。因此，我国应构建以实现信用最优边界目标为导向的金融发展战略，并通过有效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和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和完善金融信用体系等方面，实现我国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1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5
第三节 基本概念的界定	7
第四节 主要观点	10
第五节 主要创新点	12
第二章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13
第一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线性范式	14
第二节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非线性范式	23
第三节 信用扩张与金融危机研究	27
第四节 最优金融规模与结构的相关研究进展	29
第五节 本章小结	31
第三章 信用、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	33
第一节 信用的内涵与功能	33
第二节 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内涵特征与形式演变	39

第三节	金融体系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	49
第四节	金融体系的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负向效应	54
第五节	本章小结	67
第四章	金融体系信用膨胀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 跨国经验研究	68
第一节	相关实证研究回顾	68
第二节	信用膨胀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分组 面板的估计	70
第三节	信用膨胀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面板门限 模型的估计	83
第四节	本章小结	90
第五章	信用最优边界假说及其理论分析	93
第一节	有关金融边界问题的理论思想	93
第二节	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理论假说	96
第三节	偏离信用最优边界的影响因素	104
第四节	本章小结	111
第六章	我国金融发展进程中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 问题与政策建议	113
第一节	我国金融体系发展现状以及信用膨胀的基本特征	113
第二节	基于总量层面时间序列数据考察我国信用最优 边界的实现	119
第三节	基于结构层面跨行业面板数据考察我国信用最优 边界的实现	123
第四节	实现我国信用最优边界的政策建议	127
第五节	本章小结	132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134
第一节 研究结论	134
第二节 研究展望	137
参考文献	139
附录	153
后记	206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再一次唤醒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反思，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金融发展来促进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成为亟待思考与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探讨历来是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毋庸置疑，自货币和银行产生以来，金融体系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已被充分肯定，大量研究均较为一致地认为金融发展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11）首次论证了银行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作用，随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Raymond W. Goldsmith，1969）、罗纳德·麦金农（Ronald I. McKinnon，1973）和爱德华·肖（Edward S. Shaw，1973）通过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抑制现象的研究，提出了通过金融深化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进程。相关研究认为，一个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能够实现有效的资本积累（McKinnon，1973；King and Levine，1993）与效率提升（Shaw，1973；King and Levine，1993；Thiel，2001），从而促进投资和技术进步并推动经济增长。然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线性的吗？或者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或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金融发展总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线性演进的促进效应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通过对现实的考察,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传统线性范式分析结论相违背的一个典型事实是,伴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融危机似乎总是难以避免地在全球范围内周而复始地爆发,例如,1992年的欧洲货币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等,对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了严重冲击,这一事实已成为否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线性关系的重要证据。

从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需要进行重新地审视(Haiss et al., 2011)。近年以来重要的实证研究通过对大量国家面板数据的分析,发现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结构关系,集中体现为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在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国家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弱化、消失甚至逆转的现象(Ram, 1999; Fink, Haiss and Mantler, 2005; Caporale et al., 2009; Rousseau and Wachtel, 2011)^①。为什么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会发生弱化、消失甚至逆转?是什么因素系统地影响或改变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结构关系,这是重新审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内在关系的重要切入点。关于这一问题,目前相关研究主要认为,过度的金融发展或过快的金融自由化进程会产生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此进行阐述,如金融体系的“挤出效应”说^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收敛说^③、金融虚拟化与独

① 如Rousseau和Wachtel(2011)通过对广泛的国家样本进行考察,发现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正在实质性地减弱和消失;Fink等(2005)通过分别考察市场经济国家和转型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是脆弱的,而转型国家的金融部门则具有明显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按照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Bangake和Eggoh(2010)发现低收入国家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要强于高收入国家,类似结论还有Masten和Coricelli(2008);依据金融发展程度将国家划分为三个层次,Rioja和Valev(2004)发现金融发展程度低的国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并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而金融发展程度中等的国家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为正并且很强,但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国家这种效应虽然为正但却弱化了。

② 金融发展的“挤出效应”说,认为金融体系吸收了实体部门的生产性资源如物质资本(Santomero and Seater, 2000)和人力资本(苏基溶和廖进中, 2010),形成对实体部门的“挤出”,金融体系越庞大,“挤出效应”就越强。

③ Aghion等(2005)在一个考虑了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框架中引入不完全的债权人保护,结果显示随着金融发展水平逐渐超过某个临界值,一国向世界技术前沿增长率水平的收敛速度就会加快,进而导致那些收敛于前沿增长率的国家,其金融发展对增长前沿的稳态人均GDP水平具有一个正向但最终会消失的效应。

立说^①、金融脆弱说^②等。尽管相关研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结构关系生成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对影响或改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结构关系的系统性因素进行深入研究。

事实上,从本质上来看,金融活动的基础与核心是信用关系的运动(李宏明,2007),金融交易的实质是通过不同的信用关系对现有财富重新进行跨时空配置的过程(易宪容,2009)。约瑟夫·熊彼特(1911)经典地论述了发挥中介功能的银行体系通过其以扩大负债方式所进行的信用创造活动对于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通过利用非货币负债增加杠杆从而实现信用创造的机制,逐渐使得银行体系的信用扩张水平与广义货币发生分离并快速增长(Minshkin, 1978; Bernanke, 1983),同时,随着金融体系的深化和金融创新技术的大量运用,使得传统意义上以银行为主导的信用创造模式被极大地扩展和延伸,不断放大的金融杠杆以及不断深化的信用繁荣机制是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根源(Minshkin, 1978; Bhattacharya et al., 2011)。与此同时,大量研究金融危机根源的实证文献发现,金融体系过度的信用扩张与金融危机的产生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莫里茨·舒拉里克和艾伦·M·泰勒(Moritz Schularick and Alan M. Taylor, 2012)基于1870~2008年14个国家长达140年的数据样本从历史演化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根源,认为金融体系信用繁荣的迷失以及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信用扩张在宏观经济中的放大作用,是导致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的系统性因素。由于金融危机的发生与金融体系消失的增长效应之间存在高度的关联性(Rousseau and Wachtel, 2011),而目前理论界对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与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仍然处于某种相互隔离的状态(Haiss et al., 2011)。因而,就很有必要基于对以上两类理论研究的梳理与整合,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的角度出发,深入

① 虚拟经济的金融独立说,认为随着各类大量的以债务关系作为基础的证券化活动的推进,加剧了金融资本的虚拟化,使得金融体系的运转逐步与实际的生产过程相背离,呈现出一种独立运行的状态(王国忠和王群勇,2005)。

② “金融脆弱说”,认为金融系统具有先天的“内在不稳定性”(Minsky, 1993),金融体系越庞大和越复杂,其稳定性就越差,从而蕴藏在金融体系内部的潜在风险会不断自我增强并通过某些不可观测的渠道向实体部门传递(Haiss et al., 2011),最终可能以金融危机的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破坏性影响。

探究金融体系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可能存在的金融体系信用膨胀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

更进一步地,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如果金融体系的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那么特定的非线性结构是否内生地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进程中的信用最优边界(即最优的信用膨胀水平),应从何种角度或者应由何种因素及条件对信用最优边界进行合理界定与分析,这不仅是对目前众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金融适度发展问题的再探讨,更是进一步从金融体系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出发,对如何实现金融发展的最优经济增长效应问题进行深入回答。事实上,金融发展必须以满足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根本目的,由于这种需求的存在,于是就催生了新的金融机构、服务和产品并推进了金融体系的深化(Ang, 2008)。因此,信用最优边界的实现需要以金融体系信用膨胀水平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需求保持有效匹配作为重要条件。目前的相关研究如洛伦索·达科特和达莲娜·格雷齐纳(Lorenzo Ductor and Daryna Grechyna, 2011)、吉恩-路易斯·阿康特等(Jean-Louis Arcand et al., 2011)、林毅夫等(2009)从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匹配性角度,探讨了有效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规模或最优金融结构问题,具有一定启发。洛伦索·达科特等(2011)认为当金融部门的产出增长率等于生产性部门产出增长率的4.5%时,就达到了经济的生产能力边界;吉恩-路易斯·阿康特等(2011)认为当金融系统向私人部门提供的信用规模增速超过了GDP增速的110%时,金融发展开始对产出增长具有负效应;林毅夫等(2009)从金融结构角度,认为处于一定发展阶段的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该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的规模特征和风险特性,从而形成对金融服务的特定需求,从而各个经济发展阶段的最优金融结构需要与相应阶段实体经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相适应,才能有效地实现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从金融体系信用活动角度来考察金融发展问题,由于信用关系构建了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那么以信用创造与扩张为基本特征的金融体系的信用膨胀是影响和改变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结构关系的重要系统性因素,如何基于对金融体系信用膨胀与经济增长内在关系的理论分析,进而探讨金融发展中的信用最优边界问题无疑